

Periodizing the 60s  
When the New Left Was New  
French Maoism  
Rock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 60s Movement in the 80s  
Notes from the Sixties  
Those Beats  
Outside Readings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A Very Partial Chronology

# 六十年代

先锋译丛 3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先锋译丛 3

# 六十年代

主 编 王逢振

副主编 史 建

汪民安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十年代/王逢振等编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12

(先锋译丛: 3/王逢振主编)

ISBN 7-80563-765-2

I. 六… I. 王… III. 文化理论-研究-西方国家-文集 IV. G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820 号

书 名: 六十年代

责任编辑: 史 建

封面设计: 张 伟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荣长海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 话: (022) 23366354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4.00 元

## 前 言

“先锋译丛”第一辑即将面世，也许有必要对我们的编辑意图和今后的打算略加说明。

1998年春，史建先生告诉我，他希望出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译作。当时我恰好正在考虑几位外国朋友的建议，想编辑出版一些“短、平、快”的翻译小册子，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有关理论和现状。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很快便初步确定了这套书的基本框架。

正如“先锋译丛”这个名字本身所表明的，我们所选作品带有某种“先锋”的特点。但这里“先锋”一词的含义不是指“先锋派”，而是指前卫和新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将尽量跟踪国外文化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选译新近出版的作品。历史不可能割断，因此与当前热点问题相关的作品也将适当考虑。人们可能会说，“新”不一定就好，应该选译一些经典作品。此说固然有其道理。但毕竟新的更贴近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就文化研究本身而言，因其与后现代或后当代(post-contemporary)社会的密切联系，紧扣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多以“现在时”甚至“将

来时”的话语讨论，充满了创新的活力，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其实，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是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我们当前所说的文化研究里，“文化”这一术语变成了生活经验结构与认识社会变化的一种新的联系方式，变成了一种可以同时讨论两者的话语，它为个人感情结构、社会感情结构，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洞察。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对文化的这种理解；所谓某个社会的文化逻辑，其内涵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当前，随着全球化的蔓延，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如何发展，文化如何反应，构成了当前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产品以更快捷的、更多样的方式传播。其中影视文化的作用尤其明显，它可以把过去和现在、现在和将来、国内和国外的东西统统制作在一起，以视觉叙述的方式使它们变成后现代的平面万花筒，并由此使文化泛化，成为可供日常消费的东西。因此，今天要研究社会文化，不可能不考虑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里的种种现象，如迪斯科、乡村音乐、摇滚音乐、音乐电视、广告招贴、流行小说，乃至妓女和性文化。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第一辑的三本书里分别侧重于三个不同方面。《摇滚与文化》收入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摇滚音乐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听众的影响。摇滚音乐

在西方影响了现在仍然活着的几代人,在我们国家正在影响着年轻的一代。我们希望这本研究摇滚音乐的小册子能为学者和爱好者提供某些借鉴,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摇滚音乐进行正确的认识。

《“怪异”理论》论及当前在美国出现的文化热点——“怪异”的文化内涵及意义。“怪异”(queer)指人际关系中的“奇怪”现象,如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第三性等。这些现象通常被人们认为“怪异”或“奇怪”,有这种现象的人常常遭到歧视,形成不平等的群体关系。而有这种现象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奇怪,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与他人的平等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人们认为“怪异”现象可以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相类比,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意识形态构成和无意识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对“怪异”现象进行阐述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60年代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和反传统运动,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历史意义?《六十年代》收集了当时一些参与者的文章,从不同视角描述了当时的一些活动和事后的认识,并根据今天的认识做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总结60年代,吸取经验教训,仍然是当今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希望《六十年代》能够激发人们的思考,不是否定,而是以辩证的、历史化的方法去认识其中的积极意义。

按照我们的设想，“先锋译丛”每年将出版3~4本，每本一个主题，收集多人相关的文章，尽可能反映该主题项下的最新成果。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有许多方面的限制，除去时间、空间（包括版面空间）之外，还有人力（如译者）和物力（如购买资料）的限制。不过，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无论作为“头道贩子”还是“二道贩子”，我们都会“贩卖”货真价实的东西。

第一辑三本可以说是我们的实验，希望广大读者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不吝批评指教，以便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初步设想，明年的“先锋译丛”将侧重于“形象的转变”——从以语言为中心的形象转变到以视觉为中心的形象，对此也希望各方面的朋友提出积极的建议。

王逢振

1999. 11.

# 目 录

## 前 言

王逢振 1

## 60 年代断代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1

## 新左派何时是新的

斯坦利·阿伦奥维治 54

## 法国的毛主义

贝乐登·菲尔兹 113

## 摇滚与记忆中的政治

西蒙·福里斯 163

## 80 年代发生的 60 年代运动

大卫·艾普特 184

## 60 年代札记

马丁·杜伯曼 213

## 新左派：旧美国

詹姆斯·吉尔伯特 221

## 那些垮掉的一代

玛丽琳·科菲 227

## 文本之外

弗里德·普菲尔 233

## 备忘录：旧瓶中的新酒

欧文·沃克斯勒 239

## 一份不完全的年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安德斯·斯蒂芬森和考奈尔·韦斯特编纂 247

# 60年代断代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公开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败和错失了的机会，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道路。本文的出发点是，历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样地发生，其机遇和失败相互交错，不可分割，带着一种特定历史情境的客观制约和种种机遇，对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里提出一个推测性的描绘模式。

然而，要谈60年代的“情境”，必然要从历史时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运用眼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已经不

再时兴的历史分期模式。60年代的老战士们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复一年的戏剧性的变化，思考起问题来要比其前辈更具历史意识，这一存在事实，我们且不去管它；以代分类对我们的意义现在已经变得像对19世纪晚期的那些俄国人一样了（他们依照十年一段来划分人物类型）。某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现在发现以一种历史叙述来维护他们当下的立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于是阿尔图塞主义的局限便开始显现了出来”，等等）。好了，这里不是从理论上为历史写作中的分期进行辩护的场合。但是，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近似和同质性或同一，对于他们，我们可以很快答曰，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先搞清历史上所谓主导或统识（hegemonic）为何物的前提下，特异——雷蒙·威廉斯称之为“残存”或“崛起”——的全部价值才能得以评估。在此，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同一个相同的客观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境的结构范围之内发生的。

然而，林林总总彼此颇有不同的对立理论也会影响到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选择上。如果历史分期批判对历时性之种种潜能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潜能便牵涉到共时性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在挑选出来加以关注的历史变化的不同层面间建立联系的问题。实际上，本篇叙述

所称要就60年代说些有意义的话，就是要对其中的仅仅四个层面做一简要的勾勒：哲学史，革命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以及经济循环（基本限于美国、法国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内）。这种选择似乎不仅是要不加区别地赋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同的历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唤起那至少自斯宾格勒以来已被认为是滥用的建立同构关系（homology）的实践幽灵——这种类比平行论（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种程度上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等同”于切·格瓦拉的政治实践。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像诗歌写作这样特殊且高级的现象就不能像“现实生活”那样同等生动地显现历史的潮流和趋势——也许，由于诗歌创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状态下进行，近似一种实验室的情状，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么说，那些对于一个旧式有机历史的叙述是通过在远为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间建立起相似和同构关系来求得“表现性的”统一，这与本叙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认为这种种层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断裂（breaks）和其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同构关系。于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断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层次在其间按各自内在的规律而发展）的节奏和推动力提出一个假设。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这种历史的或叙述程序里的

弱点，结果却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让人能够对组成叙述的单个线条作某种“核实”。我们有时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领域——对历史可作无限多样的叙述阐释，惟一的限制是来自实践者（其所谓的原创性取决于其推出的新史学理论的新颖度）的慧眼机巧。于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发现针对一种活动领域（如认识、美学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规则竟然在一个远为不同、似乎毫不相干的领域又再现了出来，从而戏剧性地、令人吃惊地得以“证实”。本文中将要论及的经济层面就是这种情形。

无论如何，下文将会表明，这里要给出的完全不是传统叙述意义上的60年代史。然而历史再现正像其远亲线性小说一样，确实处在危机之中，原因也极其相像。“解决”这一危机最聪明的方法不是把历史写作同时当作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和一个意识形态的范畴予以全盘抛弃，而是——如在现代主义的美学中那样——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重新组织其传统的手法。阿尔图塞的提议似乎是这种局面下最为明智的办法：鉴于老式的叙述或“现实主义的”历史写作成了问题，史学家就应该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概念，至少这将是本文的冒险尝试。

## 1. 第三世界的开始

以发生在英属和法属非洲土地上的伟大的非殖民化运动作为第三世界 60 年代的开端，似乎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议。最能表现真正第一世界 60 年代的典型特征都要晚于此，无论是反文化意义上的吸毒和摇滚，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学生新左派和大众反战运动，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事实上，以政治上来说，第一世界的 6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政治文化模式的意义，如在象征性的毛主义里的第三世界主义。此外，它的反战活动所针对的正是遏制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战争（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贝尔登·菲尔兹提出，涌现出声势最为浩大的学生运动的两个第一世界国家——美国和法国——所以成为得天独厚的政治空间，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身陷殖民战争之中，虽然法国新左派是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冲突解决之后）。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外是那在许多方面都堪称第一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运动——新兴黑人政治和民权运动。它们不能说是始自 1954 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是起于 1960 年 2 月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发生的第一次静坐。然而，或许可以证明，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运动，而且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运动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种运动不断交流，相互影响，贯穿了整个这一时期，其作用无可估量。

加纳的独立（1957 年），刚果的创痛（卢蒙巴于 1961

年1月遇害身亡)，继1959年戴高乐主义者的公民表决之后法属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独立，最后，阿尔及利亚革命（其内在的顶点——1957年1—3月发生的阿尔及尔战役，以及1962年通过外交方式达成的解决——或许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标在我们的概要上）——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后来人所熟知的60年代阵痛的诞生：

并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人居住：

其中五亿是人，十五亿是土著。前者拥有字词；  
其余的仅是使用它……

萨特《〈地球上的可怜人〉·前言》

于是，60年代便是所有这些“土著”成为人的时期，内外皆然：第一世界内部的被殖民者——“少数族裔”，边缘族和妇女与其外部的属民和正式的“土著民”一样。这一进程可以且已经得到了多种多样的描述，每一种都暗含了一种“历史观”和对60年代本身独特主题化的解读：按照克罗齐历史是人类自由史的观点，这个进程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经典的黑格尔式的臣服民族自我意识苏醒的过程；可以是后卢卡契的或更加马尔库塞式的关于一个无阶级类新型“历史主体”（黑人、学生、第三世界民众）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构想，或可以是关于赢得以世界舞台上前所未闻的新型集体声音说话之权力以及同时把迄今声称为你代

言的中间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的构想（萨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里意味深长地先提了出来）；与此同时，也不要忘了还有那更加严格意义上的自决或独立的政治修辞，或关于新型集体“身份”的更具心理学和文化意味的修辞。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新型集体“身份”或“历史主体”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为可能的历史情境里，尤其是要把这些社会和政治新范畴（被殖民者、种族、边缘性、性别等等）的出现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种种社会抵抗都包纳于内的那更加普遍的范畴，即传统的社会阶级观，所面临的某种危机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从思想上而是应该从体制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若是以为是社会阶级这抽象概念、尤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观里的缺陷导致了这似乎是新兴无阶级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义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体制上的一场危机，借此，一个真正的阶级政治得以表达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样的不够完美。在这一方面，美国橄榄球联盟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在1955年的合并，可以被视为把60年代新兴社会和政治能量加以释放的一个根本性的“可能性条件”：这一合并是麦卡锡主义的胜利，它保证了把共产党人从美国劳工运动中驱逐出去；它加强了美国资方与工联之间达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会契约”；它开创了一个白人男劳力的权利优先于黑人、女工及其他

少数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后者在一个旧式工人阶级政治的传统体制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这样，他们将从社会阶级里被“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种紧张而矛盾意义上（比如，在圈地的语境下）的解放，他们脱离了旧体制，从而“得获解放”去发现社会和政治表现的新形式。

美国共产党曾是美国社会里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实亡向人提示了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机是由麦卡锡主义下的镇压和因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而在苏联集团内引发的“革命”所“决定”的。欧洲共产党那里也将发生类似但又具体有别的相应事件。尤其是在法国，在经历短暂一刻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是由东欧国家的哲学家们发展出来的）之后，随着赫鲁晓夫本人的倒台及其种种实验在1964年的最终失败，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现了：自1919年的图尔会议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实际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独立地构想革命著作（“我们了解它的一切，我们并不太喜欢它。不过没有共产党，从政治上讲就什么也做不成”——这些旧式的立场，萨特在其政治新闻写作，尤其是《共产党与和平》里给予了经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义重新复活，各种意识形态面貌的超议会组织，所谓的“小团体”，跟着新兴毛主义形式大量涌现，展现了一种同样“摆脱”了传统阶级范畴的新型政治的希望。